

略论王重民同志对于版本学的研究

杨殿珣

王重民同志是长期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
工作者之一。他自1926年起，就在京师图书馆（北京图书馆的前身）工作，1934年由北平图书馆派往法国国家图书馆作交换馆员，后来又转往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该馆所藏中国善本图书，1947年回国后，任北京图书馆研究部主任，并兼在北京大学任教。北京解放后，曾短期代理北京图书馆馆长职务。在1953年，才转到北京大学，专门从事于培养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工作。

重民同志是专攻目录学的，是国内知名的目录学专家之一。关于目录学的专门论著，已经出版的有《老子考》、《国学论文索引》初编、《日本访书志补》、《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》、《图书与图书馆论丛》、《敦煌残卷叙录》第一、二辑、《敦煌古籍叙录》等，还有正在印行的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，和计划印行的《中国目录学史论丛》等。

版本学原是目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凡研究目录学的必然要涉及版本学，但版本学又是一种独立的学科，它要研究刻书的历史、要研究版本流传的历史，要研究刻书家的历史，还要研究版本的鉴定等等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，不是一般研究目录学的都能胜任的。

重民同志不仅是一个目录学家，而且也是一个版本学家。他为几千卷的敦煌卷子编过目录，他为五千部的善本书写提要，他不只对宋元版本有研究，就是对近代刻本书，也很注意它的版刻源流。所以他对版本学有广泛的知识，也有很深的造诣。但他没有写过有关版本学的专著，对于版本学研究的结果，散见于他目录学的专著和一些论文里。

我不揣浅陋，试拟根据重民同志的著作里，提出有关版本学研究的六点，用以说明重民同志对版本学研究造诣之深，和研究方面之广。我所提的六点是：

- 一、由宋代书籍刻工说到南宋初年刻书制度；
- 二、由书籍的版框来确定书籍版本的问题；
- 三、依靠书籍序跋牌记考证书籍版本，要注意的问题；
- 四、用校勘方法来解决书籍的版本问题；
- 五、对于套版书发明的研究；
- 六、论书籍的异本和孤本并重。

以上六点，当然不能概括重民同志研究版本全面的成果，不过是用以略窥一斑而已。而且谈的既不细致，又未能深入，敬希重民同志生前的友好和读者们，与以批评与指正。

一、由宋代书籍刻工说到南宋初年刻书制度

利用刻工，用以鉴定版本，这是鉴定版本一种常用的方法，重民同志也经常采用这种办法，如余有丁周子义所编的《子集》二十四种，与万历间南雍所校刻的《三国志》相校对，其刻工姓氏大半相同，那末《子集》一书，为南雍所刻无疑。又如《慈溪黄氏日抄分类》的刻工，大半与明初翻刻《南、北史》的刻工相同，可以推定此书是明初刻本无疑。

又如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元明间印本的残本《晋书》，此本为何时何地所刻，过去并没有得到解决。据诸家记载，《晋书》、

《三国志》咸平初同刻于国子监，南渡后《三国志》有衢州翻本，《晋书》无闻。重民同志据刻工考之，知此本的刊刻时代为庆元中，刊刻地方为闽中建阳。重民同志在《晋书》提要中说：

……以刻工考之，知此本实为庆元中闽刻者。何以言之？百衲本廿四史所印《五代史记》，为傅沅叔先生旧藏，卷第十八有庆元五年曾三异校定一行，张菊生先生定为建阳书坊所刻，当可致信。两书刻工凡三四十人，余就此残本校之，相同者有天、明、成、仲、德、享、汝、正、君、秀、荣、用、寿、徐、茂、善、祐十七人，其为同时同地所刻，可无疑义。又世传《新唐书》，有建安魏仲立宅刊本，据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《史记》页十七上所记刻工，与是书同者尤多。《新书》记己巳年号，当为嘉定二年，上去庆元五年仅十年；且庆元、嘉定同为宋宁宗年号，则此三书者，虽不敢必同为魏仲立所刊，然在宁宗时同刊于建阳，则可断言也。进而言之，《唐书》《五代史》，南宋初同翻于湖州，意在《晋书》在南宋初，亦有衢州或湖州翻本耶？故仲立得之，又再翻此三书于建阳。……

重民同志不仅从刻工上考知《晋书》为南宋庆元间闽刻本，更根据绍兴间刻《汉书》的刻工，谈到南宋初年刻书的制度，这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，发前人之所未发。

按绍兴初年所刻《汉书》，半业九行，行十六字，注二十字。是刻传世，今无一全本，仅归安陆氏诒宋楼有残本八卷，见《诒宋楼藏书志》卷十八及《仪顾堂续跋》卷五。陆氏据讳字及卷六十五下“乌桓之垒”，乌下注“渊圣御名”，定为绍兴初蜀刊大字本。近人又据《容斋续笔》称前绍兴中分命

两淮、江东转运司刻三史版，其两《汉书》内凡钦宗讳并小书四字曰“渊圣御名”，因又据此定为绍兴间国子监所刊大字本正史，而其刊刻地点则在江东、两淮。重民同志详检是书刻工姓名，而判定所谓蜀刊者固非，所谓江东两淮者亦非是，从而与旧所谓眉山七史及南宋初年所刊九经三传单疏，发生联带问题。

重民同志的论证如下：

……此本下书口所记刻工，有王成、李文、李宪、余敏、章宇、陈伸、孙春、（以上在原版内）李详、何通、许茂、高谅、章忠、滕庆（以上在补版内）等六十余人，与世所称眉山七史其刻工同者，《宋书》有王成、许茂、陈伸、章忠，《南齐书》有王成、孙春、陈伸，《梁书》有余敏、滕庆，《陈书》有余敏、章宇、章忠、张富、陈伸、孙春。盖大史用刻工多，故姓名相同者亦多，小史用刻工少，刻工相同者亦少；然则是书与七史，应为同时同地所刻。又绍兴间国子监翻刻北宋监本群经单疏，皆认为杭州所刻，余见影印本《周易正义》十四卷，《周礼疏五十卷》，及《四部丛刊续编》《三编》所印《尚书正义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尔雅》二疏，其刻工均与是书及七史相同。又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著录《礼记正义》七十卷及《春秋公羊疏》残本，所记刻工，亦莫不与是书及七史相同，然则是书又当与国子监群经单疏为同时同地所刻。

重民同志根据上述刻工情况，因而提出“南宋国子监在杭州，杭州与蜀相去数千里，将何以解此谜乎？张菊生先生校印本百衲本廿四史，全取所谓眉山七史者影印，见《宋书》有至元十八年杭州刻工二人，因疑

其版自元时已离蜀。又见庆元中沈作宾在浙江所刻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，其刻工姓名与《宋书》同者数十人，其余六史，同者亦夥，因谓其版宋时先已入蜀。独未思若原版果刻于蜀，补修于浙，其刻工不应与五六十年后浙刻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同者多至数十人。因此论断为：“若承认《左传正义》刻于浙，则七史版应是在浙翻刻”。

重民同志的结论为：

……以刻工为证，余谓南宋初年国子监所刻群经单疏，所谓眉山七史与此淮南漕司《史记》，江东漕司两《汉书》，皆为同时一群刻工所刻，而其刻书地点，则均在杭州。重民同志因以上诸点，而推定南宋初年的刻书制度，他说：

北宋时国子监所刊群经诸史，多下杭州雕刻，及南宋建都杭州，反谓监本西取诸蜀，北取于江东两淮，皆后人习于元朝故事，因谓南宋初年监版，皆下诸地方官司雕刻，然后取置监中。余据上述诸例，愿提出相反之说。即江东两淮漕司刻本，其担任者为刻书费及校阅人，其刻书地点则在杭州。此盖南宋初年制度，据国子监所刻群书三史、七史，从可知也。

二、由书籍的版框来确定书籍的版本问题

从前所刻的书籍，一般都刻有板框。对于板框大小的记载，前人的目录已经有著录的，重民同志对于这点，特为重视。在他所编撰的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里，对于每部书版框的尺寸，都有详细的记录，他所以详细记录的原因，是因为书籍版框，也是鉴别版本的一个重要根据之一。

凡是一书的不同版本，尽管他的行款相同，而版框大小完全一致，却是很少的。

以《大明一统志》而言，有明内府刻本，有明嘉靖年刻本，有明万寿堂刻本，都有天顺五年的御制序、有李贤序，和进表，也都是半叶十行，行二十二字。但板框却不一样，内府刻本版框最大，万寿堂刻本次之，嘉靖年刻本最小。又如：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》的几种明刻本，重民同志见到的有嘉靖二年陈凤梧序刻本、嘉靖三十一年王积序刻本，隆庆四年谷中虚序刻本，隆庆六年傅希塾序刻本，万历十五年内府刻本、天启五年胡驯、陈新刻本。其中除了傅希塾刻本为半叶十一行，行二十三字外，其余都是半叶十二行，行二十三字、但是版框大小都是不相同的。现将各刻本版框的情形，列在下面：

嘉靖二年陈凤梧序刻本（25.4×16.4）

嘉靖三十一年王积序刻本（25.5×16.4）

按：嘉靖三十一年本是依陈凤梧本重刻的。卷末有牌记“嘉靖三十一年岁次壬子春正月重刊，山东济南府儒学教授胡大庆、训导冀为珩同校督”。

隆庆四年谷中虚序刻本（25.6×16）

隆庆六年傅希塾序刻本（25.8×16.2）

万历十五年内府刻本（28.9×21.7）

天启五年曹尔桢刻本（25.1×16.5）

以上所记版框的尺寸，也有因为印刷时的先后不同，而稍有差异的，但大体上相差不会太多的。

关于以上的两个例子，都是刊刻时间，距离时间较远，还有序跋以及刻工姓名，可供参考，在鉴别上还比较容易分别。另有在同时翻刻的，那在鉴别上，便需要仔细鉴别了。

重民同志对于这类的书的鉴别，也举有如下的例子：

大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，明申时行等奉勅撰。有明万历间司礼监刻本。版框为23.8×16.5。后又见一本，而版框稍小，为22.2×13.9。当为外省翻刻。考万历二十五年以

前，余梦鲤曾据内府本录为《抄略》，称版藏内府，非书肆所有。又天启元年张京元在江西翻刻，称曾见闽中书肆，有翻刻小版，则万历间至少已有闽刻。此本无牌记，行款与张京元本不合。（张京元本为半叶十一行，行二十六字；版框为 22.2×14.8 ；且不分卷。）其为闽刻，抑为其他外省所刻，只有待将来证明。

《三朝要典》二十四卷，明顾秉谦等奉勅撰。这是顾秉谦、崔呈秀、冯铨等迎合魏忠贤的意旨，用以实诸正人罪名，而借以揶揄当时贤士大夫而作的书。据《明实录》，天启六年五月辛卯云：“上命《三朝要典》副本，即发礼部刊刻，赐给百官，颁行天下”。又八月丁巳云：“大学士顾秉谦等题：《三朝要典》书成，查照《明伦大典》事例，给赐诸臣，颁行天下，暨各省直，令翻刻广布，以昭三朝慈孝，万世是非。从之”。可见这书除了内府刻本外，又命令各省翻刻广布，当时流传的刻本，一定很多。但在崇祯初年，已经诏毁之，后又列入乾隆年间的《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》、《违碍书目》里，几经禁毁，流传至今的已经不多了。此书的内府刻本为半叶九行，行十八字，版框为 26.5×17 ，重民同志以北京图书馆藏另一本校之，行款与内府本全同，而文字与版框均较小，版框为 19.8×13.8 ，相其刀迹，疑为南京所复刻。又北大图书馆有藏本，行款与内府本全同，惟文字与版框大小，介于内府原刻本与南京复刻本之间，版框为 21.1×14 ，当是另一省直所翻刻。

以上所引的例子，翻刻本如无牌记，定为何地翻刻，极不容易，不只是鉴定版本上要心细如发，还要以各本对勘，否则便很不容易解决了。

三、依靠书籍序跋牌记考证

书籍版本，要注意的问题

一书的序跋、牌记，可以考证出一书的

刊刻年代与源流，刊印经过与修订情况，失去序跋牌记的书，往往会造成鉴定的困难，因而著录错误。例如明刊黑口本《春秋繁露》十七卷，本有嘉靖甲寅赵维垣序，知为嘉靖年四川布政使司所校刊，但《郎园读书志》著录为明初刊本，这就是由于失掉序文而著录错误的例子。所以一书的序跋是非常重要的。

但是依照序跋牌记而定一书的刊刻的时代地点，或着一书的刊刻源流，也不能掉以轻心，认为根据序跋牌记，便毫无问题。重民同志在他所写各书提要里，特别提到这点，这也证明重民同志对于审读序跋牌记时，是逐字逐句，从不轻易放过，有时还需加一番考证工作的。

现在举几个有关序跋的例子：

明王锡爵的《文肃王公奏草》二十三卷，为其子王衡所彙辑，其孙王时敏所校梓，刊于万历年间，但后印本有天启二年何乔远序，这篇天启二年的序是后印时所加，如果把刊书的年代定为天启年间，那就与事实不符了。又原刊本申时行的序文是宋体大字，后印本改为锡爵孙王时敏书，不校以原刊本也是容易致误的。

明高拱的《掌铨题稿》三十四卷，首有隆庆六年自序，说明这部题稿是他亲自编定的。但在序后有“时康熙岁次丁□□月上已曾孙有闻重刊”一行，字体和全书不一律，这大约是后来刷印时所增刻的。然此书实系明刻本，如果根据有闻所记，定为清刻，那就错了。

明万历年间《新镌葛稚川内篇》四卷《外篇》四卷，“内题金陵张可大评校，慎懋官阅”。有卢舜治序，谓“余晚年颇嗜古文词，偶得宋本一，殚力磨勘，藏之櫝中。已又得王府本一，藏经本一，复殚力磨勘，藏之櫝中，重櫝而珍之，未售也。迨万历己亥岁，古泉氏请付剞劂。自余善本出，而鱼成鲁、虚成虎之误免矣。”据卢序这个本子真

是一个善本了。但重民同志持以与慎氏原本相校，明明是就慎氏原刻上版，原书题抱朴子，改题为葛稚川，其剜补之痕迹又甚显然。这可说明卢序所谓曾校宋本、明王府本、和道藏本者，不过大言欺人耳。按慎氏原本有王文禄序，署为万历十二年，此本刻于万历二十七年，后于慎本者盖十五年。

嘉靖年秦藩刻本史记一百三十卷，据允中道人序谓：“往者关中旧刻《史记》有善本，求之者众，版既随去而索愈繁，不可得也。予叔考定王得苏州本，命工刻之，刻成自序，以与求之者便。予考端王，素嘉尚是书，日取观之。迨予绍立，谓此书刻之逾载，字颇漫灭，观者欢诵，予亲校理，再治一新，非徒成夫先志，实为观者易于览焉。”据允中道人序，谓是书是据苏州本校刻，所谓苏州本，当是指王延喆刻本。重民同志用秦藩本与王本相较，有合有不合，但校以正德年廖铠在关中刻本，则莫不相合，其为翻刻廖刻本无疑。允中道人序所谓据苏州本者，谓得自远方，用以贵其书耳，假若相信允中道人的序文，这就受了他的骗了。

从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，可见依据原书序跋，还要加以鉴别和考证，要鉴别序文所刻的年代是否与原书为同一时所刻，还是后来补刻，要考查序文的内容是否有夸大与失实之处，必要时需还用其他本子加以校对，那末，才可以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来，这也就说明重民同志在这方面是下了一番钻研的工夫，提出了在辨别版本时要注意的地方。

对于书籍的序跋，应当加以分析，已如上述。就是对于刻书的牌子，有时也需加以考查。如明万历二十八年印本《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》一书，在卷三十一之后，有牌记云：“万历庚子岁秋重镌于籍山书院”然而这个本子并非重刊本，乃就万历五年壬秋刊本的原版修补重印的，并且把卷内的题衔也加以剜改，这样的本子只能定为后印本，要定为重刊本便错了。这书还有顺治年印

本，把卷末的牌记改为“顺治丁酉岁夏月重镌于籍山书院”，把万历二十八年的题衔又加以改刻。所以这类后印本的书，更不能只凭信他的刻书题衔以及刻书牌子，而必需找到原刻本加以比较，才能定为是原刻本是翻刻本，还是后印本又加以剜改修补的。

四、用校勘方法来解决书籍的版本问题

对一部书版本的考证，从书的序跋，固然可以得到解决，但有时序跋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，甚而有的序跋本身也存在问题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参校诸本，进行校勘以考其异同，便是一个很重要的办法，而且也是很主要的办法。重民同志在治目录学的过程中，对于书籍校勘的工作，下过不少工夫，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，所以在研究书籍的版刻源流上，在版本的优劣上，也经常用校勘的办法来解决。

现在举几个例子来说明。

明嘉靖间柯维熊校正《史记》一百三十卷，流行较广，为世人所熟知，与王延喆本并称。正德间廖铠刻本《史记》，字体行款与柯本相同，一定同出于黄善夫本，既然同出一源，两种本子究竟那一种本子较优呢？重民同志据涵芬楼影印黄善夫本，用以校勘廖铠刻本和柯维熊校正本，得出如下的结果。黄本卷末记史文若干字，注语若干字，柯本并删去，廖本仍之。王本大题在下，格式近古，柯本因窜入“莆田柯维熊校正”一行，因移大题于小题右下旁，失古意矣，而廖本一仍黄本之旧。这是从形式上看到廖本优于柯本的地方。

至于内容，重民同志以《五帝本纪》互校为例。“黄帝者”，《索隐》云：“并以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为三皇”，柯本误三皇为二皇，廖本不误。“艺五种”，《索隐》云：“艺音蓺”，柯本作艺音艺，这显然是错误的，廖本蓺字亦笔误，然而还是近似的。

“节用水火材物”，《正义》云：‘孔子曰：劳勤心力耳目，节用水火材物’，今本《大戴礼》林物作材物，说明黄本误，而廖本、柯本都改为材物，说明廖柯两本都把错误改正了。只就《黄帝》这一篇，比较廖、柯两本的优劣，已经由校勘两本可以得到解决了。

下面再举一个例子，用校勘的方法来解决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两个版本的优劣问题。这是重民同志在《跋影印本四库全总目》一文里所详细谈到的，这篇文章是重民同志的遗著，发表在1981年第一期《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》上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有武英殿刻本，简称殿本；有1795年浙江绅士在杭州翻刻武英殿本，简称浙本。浙本与殿本的优劣问题，一直是使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人所关心的问题之一，但还没有人作过研究比较和评价，因为把二百卷的一部大书，从头至尾把两本详校一过，不是一件容易事。

1965年中华书局据1795年浙本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影印，这个影印本作校记凡三百三十条，其中有校浙本与殿本异同的五十八条，这五十八条异文，为评价浙本与殿本的优劣问题，提供了极可宝贵的材料。

重民同志根据这五十八条异文，作了具体的分析。首先把五十八条异文分为三组，第一组是关于图书卷数的，第二组是关于图书撰人姓名、字号、籍贯（即人名、地名）和图书的篇章名数的，第三组是关于一般文字差异的。

第一组内容共有十七条，《四库全书》著录的八条，《存目》中的九条。重民同志根据十七条分析的结果，浙本误刻、脱刻、改误者十二条，浙本可改可不改（即浙本原不误）者三条。殿本误者二条。

第二组内容共有十七条，有关于人名、地名的十条，关于篇章名数的七条，重民同志根据十七条分析的结果，浙本误刻者十三条，可改可不改者二条，还有两条，重民同

志在写这篇跋文时，因未见原书未能证实，所以暂时未作出结论。

第三组内容共有二十四条，都是一般文字差异的问题，而且在全篇（指一篇提要）的文义上绝大多数都不是很关重要的。但在重民同志分析之后，得出的结果是殿本较好的有十五条，浙本较好的有两条，另有两条皆可通，就是浙本可改可不改，大概是浙本校刻人有意识的改动。

根据以上的比较研究，浙本、殿本的优劣显著可见了，过去由于浙本广泛的流通使用，在读者中起了一定的影响，于是有浙本优于殿本的说法。但重民同志根据自己的想法，认为翻刻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浙江绅士们绝对不敢改动殿刊本的原文，浙本、殿本如果有不同的话，只是翻刊本中刻错、刻脱的字，所以浙本的错字，只会增多，不会减少。现在根据校记中校出的五十八条，经过进一步研究之后，知道有一些地方的确是刻错、刻脱的字，还有一些地方是在翻刻过程中经过校刻人有意识改动的，有意识改动的地方，有的是改对了，有些是改错了。证明重民同志的想法是不错的。

以上是用校勘来分别版本优劣的例子。

以下再谈谈用校勘方法，说明版刻源流的问题。

在上面曾经谈到秦藩刻本《史记》是出于廖铠刻本，说明允中道人序是不可靠的，这是由于用廖本与秦藩本两个本子校勘的结果而知，现在不再重复了。

比较传本不多的明正德年白鹿书院刻本《史记》，也因为流传不广，见者不多，莫能断定是出于那个本子。重民同志曾用宋绍兴中单刻《集解》相校，知道白鹿洞本与宋绍兴单刻集解本相同，因而疑其从绍兴庚申朱中奉宅刊本出。

杨慎在明嘉靖十九年校刻的《宣和画谱》二十卷，这是在明代最早的刻本，孙星衍在《廉石居藏书记》中，称为“此本最

古，在诸本前”者是也。杨刻本所据的又是什么本子呢？重民同志看到了元大德刻本，用大德本与杨刻对读，证明了杨本确实是出于大德本。杨本的初印本与后印本又不同，大德本有墨钉，有空格，杨氏初印本都作空格，但后印本却以意填补，如大德本卷三《僧贯休传》：“太平兴国初，太宗诏求古书”，太宗上空二格，这是大德本所据宋本原来如此，杨本后印本在太宗下补‘特下’二字。大德本卷十二《王诜传》，“于是神考选尚秦国大长公主”，选字上空两格，杨本后印本补“特诏”二字，又：“即其第，乃为堂曰宝绘”，绘字下空一格，杨本后印本补‘堂’字；“神考一见而为之称赏”‘一见’上空两格，杨本后印本补‘每每’两字；‘至其“奉秦国失欢，以疾薨，神考亲笔责诜曰”，‘以’字‘亲’字上，各空两格，杨本后印本上补‘主寻’，下补‘下诏’。又杨本九行十九字，大德本十行十九字，杨本卷六《杜霄传》“未易得之故峽”下脱十九字，盖因上版时推行，故适脱一行，然据此更可推知杨本乃从大德本出，至于从字体上看，杨本依元本抚摹甚工，字体犹存大德本风度，这也可以说是杨本从大德本出的一个很好的例证。

五、对于套版书发明的研究

重民同志在1948年6月，曾写过一篇《读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因略谈我国的善本书》一文，（后收在《图书与图书馆论丛》里），他对于朱墨套印法的发明，有所考证，他说：

朱墨套印法的发明，就我现在所得到的史料，只能说是万历三十年或稍后的时候，徽州人发明的。北平图书馆藏的《闰范》，郑西谛先生所藏的《程氏墨苑》，和流到日本去的《风流绝畅图》，是三部比较早的朱墨本，都是刻印在徽州。《风流绝畅图》是万历三十四年刻的。《闰范》就是《女范编》，原来的墨版刻在万历三十

年，套印的朱版大概是万历三十五年或前一年方才另刻了加上去的。万历三十四年以前印的《墨苑》也只有墨版，带彩的套版也是三十四年以后新加的，所以我疑猜朱墨套印的发明，就在万历三十年与三十四年之间。

后来他又收集资料，详加论述，写为《套版印刷法起源于徽州说》，发表在1957年《安徽历史学报》一卷一期。

他在这篇文章里，分为五段来加以说明：一、在写本、印本初期对套印所反映出来的要求；二、论一三四一年朱墨印本《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注解》和这一时期内对于彩色印刷提出了更多的新要求；三、综述套版印刷法发明前夕印刷术的发展情形；四、徽州印刷工人发明印刷法和当时地方上的特殊条件；五、套版印刷法从徽州向外传播和进步。

这篇研究，主要是分析了一六〇〇年以前——套版印刷法没有发明以前，在长时期内对于套版印刷法的客观需要，和印刷法在各个时期内的一些线索。谈到早在第一世纪人工造纸还未十分通行的时候，贾逵研究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写成《朱墨列（别）》一卷，董遇也以研究《左氏传》著名，他的著作有《朱墨别异》，这都是用朱墨两色来分别‘经’和‘传’的；陆德明在七世纪初年著成《经典释文》，指明书的抄写法是：“以墨书经本，朱字辨注，用相分别，使较然可求”。

我国自从发明了雕版印刷以后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，在1341年出现了用朱墨两色合印的《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注解》。这个印本的经文是根据鸠摩罗什的译本，注解是资福寺僧思聪作的，正是采用了《经典释文》的方法，经文大字，朱印；注解双行，墨印。每页上的经文不到几个字。它的印法虽说使用了朱墨两色，但恐怕不是两版套印，而只是用一版涂上两种印色印成的，这是朱

墨印法的第一次创造性的试验，是朱墨套印法的发明必需经过的阶段。

直到十六世纪的末年，才由有高度智慧的印刷工人，首先发见了走向套版印刷法的道路，胡应麟（1551——1602）的《经籍会通》里面，说当时的贵重图书印本有“双印者”，好象有可能就是指的朱墨套印本。他说：“凡印，有朱者，有墨者，有靛者，有双印者，有单印者。双印与朱，必贵重用之。”这个很有可能是指的套版印刷，但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，还没有见到这样的印刷品。郑西谛先生购得一部彩印本《花史》，定为1600年印本，郑先生说：“是用几种颜色涂在一块雕版上的，如用红色涂在花上，绿色涂在叶上，棕色黄色涂在树干上，然后覆上纸张，刷印出来”。总之，在套版印刷发明的前夕，彩色版画都是采用这种方法来印刷的。

重民同志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，判断徽州人发明套版印刷法应在1602年以后，仍旧维持他在1848年的提法。根据这种论断，纠正了前人许多错误的说法，所以这篇对于套版印刷发明的探讨，对于鉴定套版书是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。

六、论书籍的异本和孤本并重

重民同志在研究太平天国文献的时候，提出了“异本与孤本有同一价值”的提法，因为剞劂在前的本子，历史上的价值当然最大，然无异本，就不易窥见先印本的精诣之所在。也就是说不把不同的本子互相比较，便不容易发见问题之所在。当然太平天国文献的版本情况，与一般书的版本情况是不同的，其前后的变化与一般书的变化自不能同量齐观，然而却可以说明，研究太平天国文献版本的前后不同，可以解决太平天国的一些有关的问题。

重民同志对于太平天国文献，曾用不同的版本，相互校勘，说明两本异同之处，实

有极大意义存焉。

我们现以对于儒家的态度前后不同一事，作为举例说明如下：

普鲁士国立图书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都藏有《太平诏书》，普鲁士藏本，剞劂在先，巴黎藏本是修改后的重刻本。重民同志就两本比较来看，可以看出有值得注意的几点：

1. 普鲁士本所引孔、孟之说，《诗》、《书》之语，巴黎本或着删削，或着改称古语。《原道醒世训》引《礼运》“孔丘曰：大道之行也”一节，共百三十四字，巴黎本完全删去，又引《易经·同人卦》，也都删掉。《原道觉世训》引《中庸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语三句，也删去不用，又引《孟子》、《诗经》，原语虽未删去，但避开《孟子》和《诗经》的书名，而改为古语云。他如《原道救世诏》：“贤否与循《内则》篇”，改为“贤否与宜侍养虔”；“盍歌《麟趾》詠振振”，改为“不犯天法得超升”；“《孝经》当明”，改为“孝道当明”；“《蓼莪》诗可读”，改为“孝顺条当守”。甚而经、史二字，亦易以“前代”二字。
2. 普鲁士本所引古事，凡为儒家所常称道，而不合于宗教者，巴黎本都删去了。《救世诏》第一不正淫为首，巴黎本删去“颜回好学不贰过，非礼四勿励精神”二句。第二不正忤父母，巴黎本删去“历山号泣天为动，乌为耘只象为耕，尊为天子富四海，孝德感天夫岂轻”四句。第三不正行杀害，巴黎本删去“是以先代不嗜杀，德合天心天眼开，宠绥四方惟克相，故能一统受天培。夏禹泣罪文献洛，天应人归无可猜”六句。第四不正为盗贼，巴黎本删去“君子临财毋苟得，杨震昏夜尚难欺，管宁割席因歆顾，山谷孤踪志不移，夷齐让国甘饿死，首阳山下姓名垂”六句。第六不正为赌博，巴黎本删去“孔颜疏水箪瓢乐，知命安贫意气扬”二句。
3. 普鲁士本由古道今、或以今溯古者，巴黎本不改为上帝，就改为天王自己。如《救世诏》“自古君师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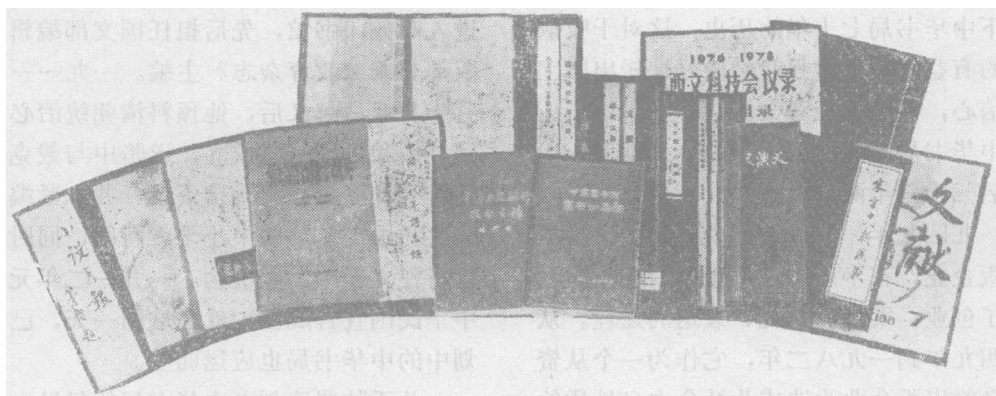
异任，祇就正道觉斯民；自古善正无异德，祇将正道淑其身”。四句中的两个‘自古’，巴黎本上句的‘自古’改为‘天命’，下句的‘自古’改为‘天生’。“古来善正修天爵，富贵浮云未足奇”，‘古来’也改为‘天生’。请观桀纣君天下，铁统江山为酒亡’改为‘天父上帝最恶酒，切莫鬼迷惑灭亡’。《醒世诏》：‘王者不徂众庶，故能成其德’改为‘上帝广生众生，故能大其德’。以上是改为上帝的。又《救世诏》：‘过而能改方无过，古人所以诲谆谆’，下句改为‘余今所以诲谆谆’，这是把古人改为天王自己的。

对于儒家态度前后之不同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重民同志对于此事作了具体的分析，他的分析解释如下：

太平天国在癸好以前，何以崇尚儒家？癸好以后，何以顿明教义？盖非晦于前而明于后，实有军国大事之关系在焉。考太平军于辛开闰八月，攻破永安，至壬子二月永安失守，洪大全被擒，为与三合会合作

时期。壬子二月以后，至癸好二月陷金陵以前，三合会大头目既死，为笼络与利用三合会时期。癸好二月以后，太平军根基已固，为肃清三合会份子时期。旨准颁行官书，原刊者在壬子，修改与翻刻，盖在癸好矣。三合会之主旨在复明，故以儒家之粹语为训诫，太平军在癸好以前，既与三合会合作，欲笼络之，利用之，故其诏旨条规，不能不容纳一部分之三合会宗旨，……不能不采一部儒家学说之与教义相近者，以便宣传也。

以上这种解释，虽然不能肯定为事实确如此，然用以解释前后对儒家的态度不同，用来说明太平天国政教之前后不同，却是言之成理的。重民同志认为“校勘学之有稗史事，有如此者”。我们也可以说对于版本学之研究，其有稗史事者如此。从此也可以说明，重民同志对于版本学之研究，绝非为版本而版本，为校勘而校勘也。



新版书目文献出版物